

清朝留美学童： 开眼看世界先行者

无一贵胄子弟

第一批留美幼童，无一贵胄子弟，80%以上来自与洋人有商贸往来的沿海地区广东。刚踏上异国土地的幼童们，对什么都感到新奇。没见过那么高的楼，煤气、自来水、电铃，还有电梯，更想不通蒸汽火车到底是怎么在两条细细铁轨上行走的……

当时幼童中的一个男孩，更不会想到，有朝一日会成为京张铁路的带头人，他的名字叫詹天佑。

惊奇的不止是我们的中国孩子，面对这些穿着长衫长褂，留着快拖到地面的辫子的小少年，美国民众也忍不住对他们驻足围观。

虽然看起来格格不入，但这批孩子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。他们飞速越过语言障碍，适应了当地生活和文化。他们甚至受到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。

有中国学生的地方，绝

对少不了“优秀”的赞美。出自中国孩子之手的留言簿，总是中英结合，钢笔毛笔并用、图文并茂。汉字书写挺拔有力，英文字体飘逸秀丽，绘画作品栩栩如生。

仅仅留学一年零五个月的幼童梁敦彦，在留言簿上写下过这样一首英文诗：

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
我的名字叫 Fabby Grey
我的眼睛黑褐相加
我的皮毛柔软如丝
我喝的是满满一碟牛奶
在每个白天和夜里

幼童们在美国接受了包括军事、航海、法律、建筑工程、化学、地质学、天文学、语言学等几乎所有科目的系统学习。优秀到连美国人作为母语的英文课，也是中国孩子学得最好。

1876年，邓士聪和陈巨镛分别获得拼写一等奖和二

等奖。1880年，霍普金斯语法学校毕业班的英文和希腊文第一名被李恩富获得，周传鄂获得拉丁文和书法第一名。在沃德沃斯街公立学校书法展览中，入学不到一年的蔡廷干获得第一名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到1880年，共有超过50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。其中包括耶鲁大学、麻省理工大学、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。

中国幼童的同学，耶鲁大学教授威廉·菲尔普斯在传记中专门有一章，标题就是“中国同学”。

“回忆在哈特福德高中生活中，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，我发现记忆中最亲密的同学是一群中国同学，我想我以后再也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一群男孩，能够像他们一样优秀。”

玩橄榄球时，日后作为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炮务二副的邓世聪，总被同学们抢着要，因为他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，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。

中国幼童还组建了自己的东方人棒球队。棒球场上，日后成为大清国外务大臣的梁敦彦是最佳投手，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被击中的可能。

耶鲁大学的钟文耀，作为校划艇队的舵手，在耶鲁划船历史上颇有名气。哈佛和耶鲁之间的划船比赛，一直是北美最为悠久传统的校际赛事，可耶鲁向来输多赢少。但钟文耀做队长时，习惯根据风力对水中木块的推动判断行船状况，带队两年，耶鲁队一直大获全胜。

这些在机器轰鸣声中长大的留美幼童，在回国后，无一不为中国近代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。他们之中，有在海战中为中国捐躯的杨兆楠、薛有福、陈寿昌、黄祖莲；有毕生为中国驻美公使馆工作的容揆；有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学者钟文耀；有著名的香港太平绅士周寿臣；有第一个被允许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张仁仁……

民族的觉醒

1872年的清朝皇宫，不是很太平，皇帝和大臣急得焦头烂额。泱泱大国内忧外患，被人欺负却没本事还手，憋屈之余，总要想办法。

几个大臣商量出一个主意：挑选这个国家最为聪慧的一批幼童，送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，以此希冀救国之解药。

这120名平均年龄12岁的幼童，就这样成了背负整个国家兴衰使命的第一批留学生。他们之中，出现了一些我们今天熟悉的名字：

詹天佑，“中国铁路之父”，带领修建京张铁路等工程，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；唐国安，清华大学首任校长；梁诚，驻美公使，促成美国退还1500万美元庚子赔款；蔡绍基，北洋大学（现天津大学）首任校长……

这批幼童，日后成为活跃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佼佼者，可孩子们再成功，也终究无法遏制王朝的覆灭。

他们的经历，被拍成5集纪录片《幼童》，有人看后感叹：“他们是最早的开路人，是最激进的前行者。被顽固派讽刺，被新文化鄙视，然孜孜以行，荣辱不言。”

100多年前，清政府闭关自守，极其封闭。从皇帝到臣民，对于外国情形一无所知，更没有兴趣了解。眼界狭窄却又高傲自大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，外国皆是蛮夷之地，那里的人民既粗俗又不懂礼数，怎能和大清王朝相较。

这样的环境下，到底是谁能有胆魄和远见想出“幼童出洋”的奇妙点子？

这个人叫容闳，从耶鲁毕业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名校的人。1847年，容闳背井离乡，一路完成学业进入耶鲁大学。可他学得越刻苦，心里就越痛苦。

“没受教育之前，就是自己过日子，接受教育之后，想到中国的百姓便无法忍受，我自己得到受教育的机会，就应该让我的同胞也有这样的机会。”容闳暗自立志让更多中国孩子来留学，可这个愿望，他一等就是18年。容闳愿望的最终实现，离不开另外两个名字：曾国藩、李鸿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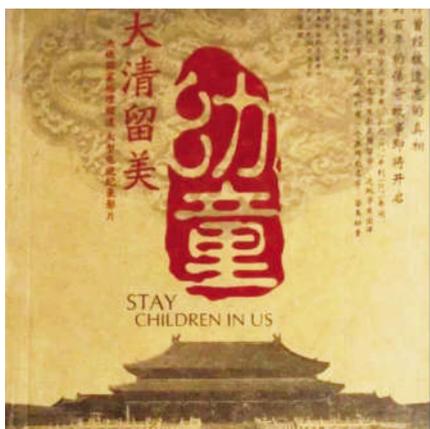
曾国藩早就意识到西洋的先进，李鸿章更是激进，在寄往总理衙门的信里，甚至敢写出这样“震惊四座”的言论：“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，以为不必学；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，以为不能学。”

在几个人的大力上奏中，朝廷有了回复：依议、钦此。

李鸿章死磕招生门槛，必须16岁以下，出身清白，思想敏捷、学东西快、长相体面，出去要能代表大国尊严。费了大劲，才终于从这个大国中，选出最优秀的第一批30名幼童。

临行前，孩子的父母和朝廷签了一份15年的合同。规定幼童必须严格遵守章程，受朝廷差遣，不能自谋职业。如有天灾疾病不测，各安天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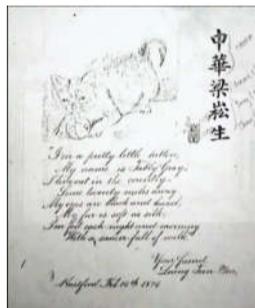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，幼童们启程了。



纪录幼童留美经历的纪录片《幼童》



邓士聪、陈巨镛



梁敦彦的留言簿



在一群人中正襟危坐的，正是钟文耀

颠沛流离的命运

当幼童们已习惯穿着运动装，活跃在棒球场、溜冰场时，他们不知道，危险已经开始了。异国的文化熏陶，让他们愈发和旧教育疏远，和旧思想分离。

他们爱上了自由，意味着马上要失去自由。

1876年，美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，16万人冒雨参加。赴会的中国海关官员李圭，遇到了同样来参观博览会的中国幼童。李圭问，参加博览会有何益处？

孩子们答，“集大地之物，任人观赏，可以增长见识。那些新机器的新技术，可以仿行，又能增进各国友谊，益处很大。”

李圭又问，想家吗？

孩子们答，“想也没有用，只有专心攻书，总有一天能回家的。”

但孩子们未曾想到，回家的这一天，来得那么快。官员吴子登被任命为留学事务局新的正局长，他发现这些留学生对他没有一点唯唯诺诺，很震惊，认为这些留学生已经失去了信仰。

他不是唯一有此想法的人，早有大臣向朝廷上书，要求撤除留学事务局，理由是：外洋风俗，流弊多端。在他们看来，这群孩子洋技能没学

会多少，恶习倒是沾染了许多，久居国外，爱国心也没了，将来怕是要坏事儿。

容闳为留住幼童极力奔忙，多位名校校长也书写联名信极力挽留，严正否认学生们“未受其益，反受其损”的传闻，耶鲁大学校长在信中大力表扬中国学生：

“不愧是来自大国国民的代表，足以为贵国增光，美国少数无知之人，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，正在逐渐消失，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，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，就要开花结果，此时撤回无异于尽弃前功。”

可一切，已成定局。1881年，在经历了9年的留美生活后，除去提前回国、滞留、因病去世的孩子，94名幼童分三批被撤回。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个人完成了大学学业。

没有人甘心。

回国的船只停靠在上海。和他们想的不一样，码头上没有久别的亲人，更没有热情的迎接仪式。迎接他们的，是同胞的排斥和冷漠。黄开甲回到广东汕头老家时，仆人甚至将这个不会讲家乡话的年轻人拒之门外。

在外求学多年，乡音已改，故乡早就成了他乡。回国

后，这批留美幼童一再遭受冷眼和羞辱。

国内媒体写他们，“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，遣诸学徒出洋，熟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。流品殊杂，性情则多乖戾，禀赋则多鲁钝。此等人何足以言西学，何足以言水师兵法等事。”

翻译成白话就是，国家耗费巨资送你们这些平民儿童留美学习，可谁让你们都是三教九流，性格乖张暴躁，天资又鲁莽迟钝。这种人怎么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怎么谈论军事兵法。

这些人眼里一无是处的庸碌之才，在《纽约时报》那里，却是另一番评价：“大清国在美国实施的教育计划，十年来，我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。”

在历史的洪流下，留美幼童的个人命运随国家大局起伏，于动荡之中裹挟着前进。他们没有资格辩驳自己的优秀，被保守派唾弃，被新青年遗忘。在“前清遗老、留学洋奴”的双重身份下，几乎没有人再想起留美幼童。

历史的滚滚长河中，他们只是王朝这个大机器中的一环齿轮，吱吱嘎嘎向前转动。回国后的留美幼童，被李鸿章派遣到天津参与洋务运动。北洋海军1888年成立，



詹天佑

大部分是赴英法海军留学的人才。它的成立带动了铁路、矿业发展，让留美幼童有地方可以施展拳脚。

可惜1905年，留美幼童命运突变，几乎成了洋务运动的陪葬品。人到中年的留美幼童，有些成了袁世凯的幕僚，在天津是官职显赫的名流。

1940年，几乎再没人想起留美幼童。1942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今时今日，他们的故事，已渐渐被人遗忘。

只有再翻开这一百多年前的黑白照片时，才发现这些面孔依旧稚嫩，那上面还有迷茫、有疑惑、有离家的哀痛、有对新世界的向往，这群国之栋梁天之骄子，在用一生践行承诺：

“此去西洋，深知中国自强之计，舍此无所他求。背负国家之未来，取尽洋人之科学。赴七万里长途，别祖国父母之邦，奋然无悔。”（选自《华人周刊》）